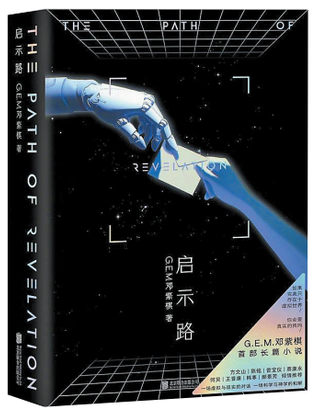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由邓紫棋“闯银河”引出的话题——

科幻文学距离“大众化”还有多远？

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

近日，知名歌手邓紫棋的科幻小说《启示路》入选第37届银河奖“最佳原创图书奖”投票名单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更有媒体将“入选”误传为“入围”，引起广泛热议。

1月4日，银河奖主办方对外发布说明，针对“《启示路》入围”消息进行澄清。据介绍，评选设有初选、复选和终选共三个环节，当前阶段为银河奖的初选环节，明确“不因特殊身份给予特殊对待”。此次邓紫棋的作品最后能走到哪一步，仍有待最后揭晓。

顶流歌手“跨界”写科幻小说，也一度引发“非专业作家能不能写科幻小说”“怎样的小说才算是科幻小说”等话题讨论。为此，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科幻作家分形橙子、文艺评论家郑焕钊，结合专业领域的一些讨论，展开关于科幻文学的思考。

分形橙子

郑焕钊

1、越来越多演艺人尝试文学创作

“知道邓紫棋入选，我第一时间是高兴。科幻文学受到大众关注，也让更多人知道银河奖这个中国科幻最高奖。”分形橙子与海漄合著的《龙之变》也入选了第37届银河奖投票名单。在分形橙子看来，该事件能有如此高的关注度，与邓紫棋的歌手身份密不可分，但它让更多人关注到科幻文学，“是一件好事”。

事实上，邓紫棋写科幻小说并非明星“跨界”进行文学创作的个例。演员陈冲在2024年推出自传性散文集《猫鱼》，歌手韩红在2025年推出诗歌散文集《我与蒙面诗人》，歌手曾轶可也曾推出科幻小说《TAYOUZI1 银壳下载》，越来越多演艺人尝试文学创作，映照出当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态势。

科幻作家陈楸帆也关注到这种趋势，但他指出，粉丝们对偶像“跨界”创作的认可，与作品质量、科幻文学出版本身的价值无关，“完全是两码事”。“就像《泥潭》此前的走红，纯文学新人写作就容易得到偏爱了吗？完全没有，它就是热闹一时的现象。”陈楸帆说。

这一观点道出了尽管创作群体扩大、关注度提升，但科幻文学似乎还未真正走出小众圈层的事实。不论邓紫棋“闯银河”最终是否成功，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节点性的结果。但它本就是一次促使大众更深入地关注科幻文学的良机，激励更多热爱科幻的人拿起笔、大胆写。

“每个人都可以拥抱科幻、书写科幻。”分形橙子引用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·冈恩的科幻写作“三原则”——首先要动笔，其次是要坚持将故事写完，最后则是将成型的作品拿给别人看，最好投稿给专业编辑进行点评，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。

“很多人在第一步就坚持不下来，因此动笔写是最重要的。只有越来越多人尝试写科幻时，科幻才能真正走进公众视野。”分形橙子说。

2、科学含量多少才算是科幻小说？

“如果完美只存在于虚拟世界，你会爱真实的我吗？”这句话源于邓紫棋《启示路》里女主角秋辰曦留给男主角聂爱凡的一封信，揭示了这部科幻爱情小说的主旨，即对于技术与人性、虚拟与现实、爱与诚的关系探讨。

尽管运用了AI、仿生人、脑科学等科学原理，但《启示路》归根结底是以科幻写爱情，邓紫棋本人也坦承这是一部“科幻爱情小说”。小说里的一些奇思妙想，在严肃的科学研究者看来更像是浪漫的比喻。以至于部分读者发出疑问：科学含量多少的小说，才算是科幻小说？

基于科学含高的高低，科幻迷们曾对科幻小说进行“软硬”之分。对此，分形橙子表示，按照作品涉及的学科进行分类或许更加合理，具体可分为物理学科幻、化学科幻、生物学科幻、数学科幻、历史科幻等。

“‘科幻’的边界之所以很难划定，是因为‘科学’的定义本就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，具有不确定性。”分形橙子以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·开普勒的《梦，或月球天文学》为例进行解释，该小说里描述了月球上的山川峡谷、城堡等景象，既符合当时人们的科学认知，也充满浪漫想象。但从当代人的视角来看，月球上有河流、可供呼吸的氧气和植被，这显然是“反科学”的。

再比如曾经获得雨果奖的《哈利·波特》，如果在原著中加入魔杖、火球等“魔法”由来的科学解释，那么这部魔幻小说就可能被改写为科幻小说。这也体现出科幻文学区别于玄幻文学、魔幻文学等类型文学的核心准则——遵循当下最基本的科学事实，体现科学精神。

“科幻小说有‘软硬之分’，而没有高低之别。在我看来，只有好看的科幻和不好看的科幻之分。”分形橙子说。

3、应从两个层面讨论科幻文学

无论是硬科幻小说，还是软科幻小说，它们都同属“科幻文学”的范畴，是将科学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相结合的一种写作方式。而事实上，科幻到底“姓文还是姓科”问题的讨论，至今也未有定论。

科幻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文学类型和出版类别，始于美国的科幻杂志编辑雨果·根斯巴克，对此学界并没有太多争议。雨果在1926年首次提出“科学小说”的概念，并对其进行了限定——“一个迷人的浪漫故事，融合了科学事实和预言性的想象……”在这一定义中，“科”“文”本就融于一体。

而在我国，尽管科幻最早肩负着开启民智的历史使命，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，它也并非完全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。不论是荒江钓叟创作的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、巴金创作的《猫城记》，还是梁启超、鲁迅等文化人士翻译凡尔纳的科幻著作，无不体现出20世纪初期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崇拜与向往。

科幻作家刘慈欣曾说，与其他文学相比，科幻有着更加丰富的不同侧面，因其涉及科技与文学两个不同的侧面。他指出，“科幻并不是科学与文学的简单相加，而是两者的相乘。”

郑焕钊则认为，应从两个层面讨论科幻文学。站在纯粹的科幻文学层面，专家学者及专业写作者需要对科幻文学的内在界定进行厘清，辩证科技与想象的关系，在此过程中才会有“真正的科幻小说”的存在。而站在科幻文学创作的层面，科幻小说作者将“科幻”作为写作资源，将自己熟悉的叙事模式或故事类型与科幻背景相融合，属于广义上的泛科幻写作。

4、中国科幻文学日益受到国际关注

自刘慈欣《三体》系列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现象级成功以来，中国科幻文学正日益受到国际关注。2023年，青年作家海漄凭借《时空画师》斩获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，成为继刘慈欣、郝景芳之后，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幻作家，中国科幻再次“惊艳”世界。

越来越多科幻作品呈现出类型多元化、传播国际化的特点。如刘慈欣的《流浪地球》写出了气派的中国式“星空浪漫主义”；郝景芳的小说《北京折叠》，探讨后现代的城市空间问题；长篇科幻小说系列及同名影视剧《三体》被译为英文版“出海”；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《独行月球》等，在国内外掀起了一阵阵“科幻热”。

“欧美国家一直关注着中国科技的发展。随着全球关系格局的变化，他们需要通过中国的科幻文学来理解中国人对未来世界的观察、理解和想象。”郑焕钊说，中国的科幻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，这既与中国科幻作家的创造力有关，也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想象力的深度关切。

在影视化改编加速推进、创作群体持续扩大的背景下，科幻文学距离真正的“大众化”还有多远？

郑焕钊分析指出，尽管科幻产业总体发展势头强劲，但作为产业源头的科幻文学在发展上相对缓慢。一方面，科幻文学需要借助影视、音乐、游戏等大众媒介实现传播突破，而当前中国影视工业在技术层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短板。“举个例子，《三体》电影版因为制作质量问题，至今仍未上映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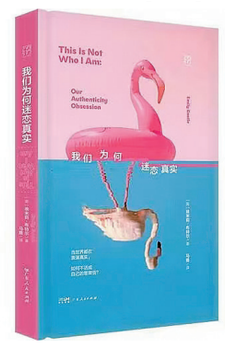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方面，科幻作品不一定都能实现影视转化，背后需要强大的编剧力量。“虽然中国科幻已诞生刘慈欣这样的标杆作家和《三体》这样的现象级作品，但我们在故事体系构建和原创能力方面仍有不足，内容积淀上还不够硬实。”郑焕钊说。

“现在科幻文学虽然很受关注，但实际上市场并不大，读者群体规模较小。”分形橙子认为，在此背景下更需加强科普教育，通过中小学课程培育青少年想象力，鼓励新人创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自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开设国内首个科幻文学专业方向以来，清华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长春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开设科幻文学课程，科幻文学研究逐步进入高等教育体系。

出版书单

《我们为何迷恋真实》
埃米莉·布特尔[英国] 著



作者追踪“活出真我”从浪漫主义、哲学概念一路演变为社交媒体口号的过程，指出“真实性”这一理想在滤镜修饰、自我叙事、身份政治化语境下，早已成为一项表演任务。真实性原本承诺自由，如今却成了自我规训的新工具。

《剑桥一年：关于爱与拥抱的自我民族志》
邱不苑 著

一部在创伤中寻找力量的成长记录，刺破世俗叙事，剖解情感机理。以自我民族志的书写，将剑桥一年的经历与过往的情感挣扎交织，在爱与关系的迷局中，展现女性挣脱束缚、拥抱自我的艰难与勇敢。

《雨后大地》
缪睫 著

书中这对曾为职场“牛马”的年轻人选择返乡种地，躬耕山野十年，种下满山有儿时味道的蔬菜瓜果，一砖一瓦地自建住房，努力建设和经营生态农场。全书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自然的敬畏、对劳动的尊重，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实践与思考。

《葱岭之外：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》
侯杨方 著

以葱岭（帕米尔高原）为锚点，清晰展现东西方文明数千年来的碰撞、融合和新生，让“丝路”从抽象名词变成可触摸的真实历程，将中亚这个边缘地带，描绘成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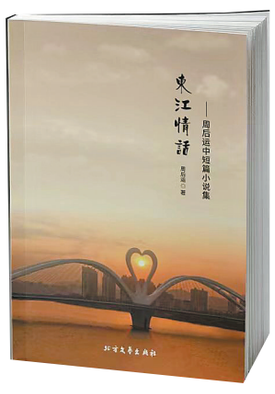
《崇祯七十二小时》
唐元鹏 著

跳出王朝覆灭的宏观叙事模式，以崇祯生命最后三天为切入点，放大时间颗粒度，聚焦北京城破前的关键细节：从居庸关被内奸出卖、南迁之议的拉锯，到城防漏洞、太监与文官的阴谋勾结，将王朝崩塌的过程拆解为可感知的具体事件，呈现“大历史”下被忽略的“技术性细节”。

微观

在线性叙事中拓展文本的现代性

□陈南先



周后运小说《东江情话》的再版，不仅是他文学创作的重新亮相，更是一次对当代中国城乡变迁与个体精神成长的回溯。作为一部以“三农”题材为基色、以进城务工青年为主体的文学作品，它既承载着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，又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东江流域的生态画卷。

这部作品讲述了乡土青年到城市寻梦的故事。周后运自己也是作品中的人物缩影，《东江情话》的很多作品，写出了作者的童年记忆与文学启蒙。作者出生于湘西南山村，童年与放牛、拾粪、割草为伴，甚至因贫困而饥寒交迫，结束军旅生涯之后，他在南国寻梦数十年，变动十二次工作，但毅力和勇气从未消退。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其坚韧的品格，更为其创作注入了底层视角的真诚。正如小说中刘梦林与丽娜“你吃了吗”的日常问候，折射出物资匮乏年代里朴素情感的珍贵。这种对细节的敏感，源于作者早年“摘桃树油、拾野蓖麻籽”的辛酸，也由此催生了其作品中特有的“饥饿叙事”——对温饱、知识与尊严的共同渴求。

来到南方之后，周后运将法律意识与文学创作结合，使《东江情话》超越了单纯的情感故事，成为农民工群体争取权益的精神象征。小说中刘梦林从工厂员工成长为律师，并为外来工追讨欠薪的情节，正是作者自身经历的文学投射。在文学特质上，作品体现了田园牧歌与现实主义的交织。《东江情话》的独特魅力，在于其以抒情笔调书写现实议题的平衡能力。作品以东江为地理轴心，描绘了“碧水盈盈”“白帆片片”的自然风光，更以“龙舟竞渡”“粽子飘香”等民俗场景，构建了一幅岭南风情长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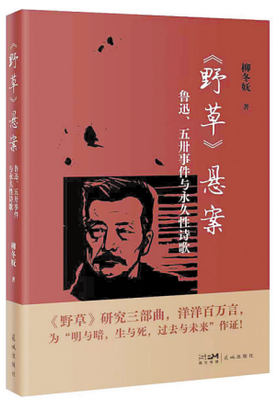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中的人物塑造，也具有典型性与时代性。刘梦林与丽娜的形象，分别代表了进城务工青年与留守乡村女性的双重命运。其中刘梦林从法律专业大学生到维权律师的蜕变，展现了知识改变个体命运的可能性。丽娜通过自学考取行政管理文凭、协助父亲经营果品加工厂，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女性成长。在创作手法上，小说采用“现在进行时”与“回忆穿插”的过去时双线结构。一方面以龙舟赛、东江泛舟等场景推动主线剧情；另一方面通过书信往来、高中校园生活回忆等插叙，深化人物情感层次。这种结构既保留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，又拓展了文本的现代性。

《东江情话》的再版，恰逢中国城镇化进程进入深化阶段。作品中的核心命题至今仍具现实意义。

自序

《野草》与“永久性诗歌”

□柳冬妩



《野草》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文本，它的不可阐释性，恰恰构成了它丰富的阐释性，具有一种难以明晰却又引人永久品味的艺术魅力。

1925年6月28日，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，首次提出“诗歌较有永久性”的观点：“那一首诗，意气也未尝不盛，但此种猛烈的攻击，只宜用散文，如‘杂感’之类，而造语还须曲折，否，即容易引起反感。诗歌较有永久性，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。沪案以后，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，其实是没有意思的，情随事迁，即味如嚼蜡。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，不宜做诗，否则锋铓太露，能将‘诗美’杀掉。这首诗有此病。我自己是不会做诗的，只是意见如此。”在五卅惨案发生后，面对那些“极锋利肃杀的诗”，鲁迅强调诗歌自身的独立性，也即诗歌是区别于杂文的。这种对“纯诗”的苛求，体现了鲁迅的现代主义诗歌观念。

谦虚自己“不会做诗”的鲁迅，恰恰在现代主义“诗美”信条的支撑下，创作了“较有永久性”的散文诗《野草》。1925年之后，鲁迅多次提及诗歌（文艺、文学）“较有永久性”的观点，最后一次是在小说《采薇》里戏拟与反讽了一下“永久性”：“你瞧，这样的诗，可是有永久性的……”

鲁迅关于“诗歌较有永久性”的观点，可能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。鲁迅开始写作《野草》时，正值翻译出版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《苦闷的象征》，在该书第三部分《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》第二节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》中，厨川白村论述了艺术的“永久性”问题：“作为个性的根柢的那生命，即是遍在于全实在全宇宙的永远的大生命的洪流。所以在个性的别一半面，总该有普遍性，有共通性。”“一切的艺术底鉴赏即共鸣共感，就以这普遍性、共通性、永久性作为基础而成立的。”所谓艺术的“普遍性、共通性、永久性”，就是“在有限（finite）中见无限（infinite）”。1924年10月31日，鲁迅从厨川白村的《走向十字街头》选译论文《西班牙剧坛的将星》，该文也论述“艺术”的“永久性”：“只有披了永久地，新的永久地，有着华美的永远的生命的‘艺术’的衣服，而被表现的时候，还有很可以打动现代的人心的魅力。”鲁迅所批评的那种“沪案诗”“情随事迁，即味如嚼蜡”，换言之，是因为这类诗歌不具备艺术的“永久性”“永远性”“不朽性”。

1934年10月9日，在致萧军的信中，鲁迅说“我的那一本《野草》，技术并不算坏”。“好技术”是写出“永久性诗歌”的根本保证。形式、结构、语言和风格，应该成为阐释《野草》最可靠的证据来源，而不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。

《野草》一直是鲁迅研究中一个特异的存在，其独有的形式和丰富诡异的内涵，创造了无边无际的读者，成为海内外学者阐释不尽的“无物之阵”。因此鲁迅作于1931年11月5日的《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，但鲁迅自己的说明，其难解程度并不亚于诗作本身。鲁迅说他的这些散文诗“因为那时难于直说，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”。其实这个序言本身的“措辞”，也“很含糊”，埋下了阐释学的陷阱。

从根本上说，《野草》的诗学问题也许不能直接设定为历史考证意义上的“悬案”，也无法通过历史考证本身做实为定论。《野草》所构筑的诗的世界，即使与“现实”割裂开来，即使忽略掉《〈野草〉英文译本序》，也具有值得鉴赏的审美价值，它也许永远属于未来时态。